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周新民,杨诏棋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关键词】孟浩然;交游赠答诗;隐逸情怀;仕进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17-05

诗歌赠答之风由来已久,爰自先秦。先秦赋诗言志之风盛行,以诗传情达志,对话交流,一来一往,一赠一答,可谓文士赠答之雏形。先秦所赋之诗源于《诗经》之句,非文士自创,然观其形式内容,盖似今者所言之赠答诗。昔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清黄宗羲《汪扶晨诗序》云“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是也”,由此观之,此种诗型可谓“诗可以群”功能之践履。文士彼此交游,赠答酬唱,交流情感,是以赠答之作负载社交之功能。《诗经》誉为诗歌之祖,赠答诗即发轫于斯,如吉甫所作《诗经·大雅·崧高》。逮至建安,文士诗歌赠答酬唱蔚为风气,日臻成熟,至唐宋而盛焉,渐为文人创作之大宗。

唐代文士交游甚广,赠答酬唱之作甚多,如襄阳孟浩然是也。现观孟浩然诗集,有王士源别为七类之孟集,亦有刘辰翁别为十类之孟集,然纵观王、刘二人分类之法,盖受萧统《文选》之影响,难脱强行相分之嫌、分类过细之弊,以致归为赠答者甚少。纵观孟集,诗作凡260余首,窥其创作初衷,察其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山水田园诗、交往赠答诗与怀思兴叹诗三类。孟浩然交往赠答之作,盖指集中诗题冠有“寻”、“访”、“陪”、“示”、“与”、“同”、“宴”、“呈”、“寄”、“赠”、“贻”、“逢”、“送”、“留别”、“和”等字词之作,如《寻香山湛上人》、《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等,观孟赠答酬唱之作,凡130余首,约占其诗作总数二分之一,颇为可观。孟浩然一生久居襄阳,间或北入京洛,东游吴越湘汉,西涉巴蜀,漫游南北,其交游对象约200余人,有身处庙堂之宰辅州牧,有心寄山林之僧道隐士,亦有相交甚密之友人乡邻,各色人等,身份性格各异,由此察之,其交游版图甚广,而细察其交游对象,审视其交游动机,

则可观照其思想倾向与人格道德追求。以下就孟浩然与官员僧道交游情况分而论之,进而探讨其思想倾向、精神旨趣。

一、交游僧道与隐逸情怀

盛唐隐逸之风甚烈,名隐辈出,诸多文士优游山水,与僧道隐士交游甚密,是以文人墨客终老林泉者,数见不鲜。孟浩然本性高逸,以隐逸闻名于世,誉为盛世隐士之典型,然隐士标签肇始于其自身,年甫弱冠即心羡隐士,“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登鹿门山怀古》)^①,旋即入山隐居,并以诗志之,“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夜来去”(《夜归鹿门歌》),其幽人之志显而易见,而后在其诗作之中更以“隐者”自许,如“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万山寄张五》)。随后李白《赠孟浩然》一诗称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勾勒其高卧林泉之风姿,王维亦为其画绢本像,凸显其隐者之风范,经李、王二人推波助澜,孟浩然隐者形象得以强化定型,并流传四方。

自古以来,荆楚地区隐逸文化兴盛,山水秀丽,再者受盛唐隐逸之风影响,是以孟浩然顿生爱隐、慕隐之心。“孟浩然诗集中吟咏的主要隐逸人物,按出现频率的高低排列依次是赤松子、许由、尚子、庞德公和陶渊明。”^②孟浩然推崇古代名隐,亦向往隐逸生活,“闻就庞德公,移居近洞庭”(《寻张五》),“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李氏园卧疾》),“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寻梅道士》)。《仙鉴》载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等十人为“仙宗十友”,其言虽不可靠,然侧面窥之,可知其与僧道往来密切。孟浩然一生与隐者、道士、上人、法师、观主等佛道人物往来密切,常有诗歌赠答,如《寻滕逸人故居》、《寻梅道士》等。或言隐居环境之幽,如“弊庐在郭

收稿日期:2014-10-09

作者简介:周新民(1987-),男,汉族,湖南耒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外,素产唯田园。左右林野阔,不闻城市喧”(《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或话山水之趣,如“予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听郑五愔弹琴》);或与道士论玄,如“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游精思题观主山房》);或与法师谈佛,如“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还山赠湛禅师》);或发慕仙之情,如“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寄天台道士》)。盖观孟浩然与方外之士交游赠答,用典涉及仙道者实繁,诸如“赤松子”、“二老”、“坐忘机”、“餐霞”之类,其慕仙向道之心显露无疑。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然儒家思想始终为时代精神之主流,唐代隐逸以儒隐为主流,而非传统之道隐。唐代隐逸无外乎如下三种模式:为仕而隐,时称“终南捷径”;仕进无门或仕途遇挫而隐,藉山水以慰心怀;亦官亦隐,休沐田居。孟浩然与僧道交游,处处彰显其隐逸情怀,然孟浩然隐逸并非始终如一,据《旧唐书·孟浩然传》载,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2]。以开元十六年为界,其隐逸有前期后期之别,前期为仕进而隐,意在立身济世,于进于退极为有利,功利性极强,后期则是仕进无门而隐,寄情山水,以慰落拓之悲,彰显其道德人格之追求,所以陈贻焮先生指出:“不要以为孟浩然前前后后总是隐居,实在前后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差异、这个过程,应该从发展上来观察他。”^[3]察其隐逸根源,可知其隐逸情怀始终难消儒家仕进思想之烙印。

(一)前期为仕而隐

大唐隐逸之风盛行,视隐逸为出仕之捷径,以退为进,目的在于乘时而出。开元十六年前,孟浩然隐居襄阳,侍亲读书,待时而出。孟浩然隐居鹿门期间,“书取幽栖事,将寻隐者论”(《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多与隐者逸士等方外之人交游,如王迥(白云先生)、张子容、梅道士、张野人等人。《寻白鹤岩张子容颜处士》、《白云先生王迥见访》、《西山寻辛谿》等诗作记载孟浩然与诸隐者逸士交游事宜,其道教出世情怀甚烈。

盖观盛唐帝国,文人士子胸襟开阔,抱四海之志,不甘谪落白首,进取精神甚烈。孟浩然亦是如此,其以孟轲后裔自许,身处江湖,心存魏阙。孟浩然隐居鹿门,曾云“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阻雪》),其名为隐而实为入仕之心态,置于盛唐时代语境之下,可谓屡见不鲜。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君主承“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之意,重视聘招隐士,给予其赐官、赐号等优待,礼遇隐士渐

成既定国策。李唐一代,以隐求仕者,皆因归隐修道而名动朝廷,既而或征召除官,或优渥恩遇,以隐逸博取高名而入仕者颇多,如卢藏用、司马承祯之流。高适中有道科之前,则隐于淇上;王维、储光羲亦曾隐于淇上。如李白等隐者以隐逸读书而名躁当世,进而制造声誉,曲线求仕,即走“终南捷径”。早年孟浩然与张子容偕隐鹿门山,《唐才子传》卷一载张子容“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生死交,诗篇唱答颇多”^[4],白云先生亦尝与孟浩然同隐,而偕隐较之独隐,其更能制造声誉,以博得皇帝征召而踏入仕途。

细察孟浩然交游赠答之作,可窥其为仕而隐之心,其《怀忆贻京邑故人》云:“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秦中苦雨思归贻袁左丞贺侍郎》云:“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由此观之,孟浩然早年隐居苦读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5],实为积学储宝,待时权变,欲博取功名而隐。孟浩然优游山水,交游方外人士之际,亦积极与官员交游,饮酒赋诗,以期官友荐引入仕,如“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与白明府游江》),“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姚开府山池》)。孟浩然早年隐居时与权力有限之“明府”交游,亦不失时机以表入仕之心,可知其早年并非纯粹之隐者,用世之心甚烈。

(二)后期不遇而隐

孟浩然隐居襄阳多年,然终未被君主聘招,或因储光羲、崔国辅、王昌龄等好友相继登第,孟浩然仕宦之心愈加强烈,其遂于开元十五年,辞亲远游,仗剑北上,赴京应举。“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初抵达京城,信心满怀,然时乖运蹇,最终落第。“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孟浩然对仕进心生怀疑,遂生回乡归隐之心:“跃马非吾事,狎鸥真吾心”(《秦中苦雨思归贻袁左丞贺侍郎》),“拂衣从此去,高步蹶华嵩”(《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孟浩然赴试落第,然其仍不甘白首,“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题长安主人壁》),对仕进仍抱希望。

开元十七年,孟浩然受唐代文士漫游之风影响,回乡不久旋即漫游吴越,而后卧病隐居故里。“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孟浩然漫游越剡,优游林下,寄情山水,澡雪心灵,与僧道交游甚密,借道家隐逸文化慰藉其落拓之悲。“扇枕

北窗下，采芝南涧滨”（《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还山赠湛禅师》），其心平静而怡然自乐。孟浩然漫游天台山、桐柏观、云门寺、大禹寺等佛道胜地，“羽人在丹丘，吾亦从此逝”（《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永愿从之游，何当济所届”（《越中逢天台太一子》）、“吾友太一子，餐霞卧赤城”（《寻天台山》）、“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山中逢道士云公》）等诗作记载孟浩然与僧道交游，可知其好佛嗜禅，向往隐逸生活，欲归隐山林，炼丹修道。天台山是道家文化兴盛之地，司马承祯尝隐于斯，后获玄宗征召，深加礼待，呼为“道兄”，孟浩然专程寻访天台山及拜谒道士，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葛晓音先生就“方外十友”论道：“毫无疑问，他们的方外之游，含有趋附时尚，以求统治者垂顾的动机。”^[6]孟浩然盘桓吴越长达四年之久，寻仙问道，可谓意在仕进。

孟浩然漫游吴越，优游山水，道家长生、仙游之想为其企求，然其并非至此而隐逸遁世。其于游观访道中所发坐忘、志道、向仙之情，多为其入仕无门而生，可视其为孟浩然寻求精神依归之举。然吴越山水并未抚平其不遇之悲，对赴试落第心存芥蒂，“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察其“自洛之越”交游之人，多为各级官员，由此窥之，吴越漫游并非单纯游山玩水，意在扩大社交范围，李景百先生撰文指出“孟浩然尽管以隐逸闻名，以游山玩水诗著称，而思想深处并不是那么静穆和恬淡，倒是相当热衷功名仕进的”^[7]，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以佛道观非其思想之主流，仕进观方为其思想之主体。

孟浩然漫游、隐居一生，其尝言“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机”（《游精思题观主山房》），然观其前后与僧道交游，并未达到“坐忘”、“无我”之境。其仕进无门，便身寄山水，心向老庄，无非以求心理平衡而已。佛道出尘出世观与儒家入世名利观截然相反，其主旨在于解脱苦厄，是以孟浩然于方外思想之中力图寻求心灵慰藉与精神归依。

二、交游官宦与仕进精神

孟浩然以隐名世，狷介清高，率性而为，世人称之为孟处士，然其并非息交绝游，遁迹山林，而是积极与官吏友人交往。孟浩然以“微云淡河汉，疏雨

滴梧桐”之诗句而名动公卿，与诸多官吏交游唱和赠答，甚至成为至交。王士禛《孟浩然集·序》载：“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摠、华阴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东独孤策，率与孟浩然为忘形之交。”^[8]孟浩然与达官显贵交游赠答之作甚多，诸如《同独孤使君东斋作》、《上张吏部》等，欲扩大人际交往，以博取名士贵人器重。观其交游活动，察其交游对象，仍未脱离文人政治社交圈。孟浩然终身活跃于文人政治社交圈，一则缘于其诗才出众，备受官吏推崇，二则是孟浩然主动交游使然，寻求官友举荐入仕。观孟浩然与官宦友人交游赠答之作，或干谒权贵，以表仕进之心，或吐怀才不遇之块垒。

初盛唐干谒行卷之风盛行，文人到处上书献诗，曳裾权门，以求援引而获仕进。如王之涣“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唐才子传》），王维干谒张九龄，而后拜为右拾遗，杜甫长安干谒、奔走权贵达十年之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孟浩然身处开元盛世，其尝言“明扬逢圣代”（《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受盛唐时代精神之影响，孟浩然与官宦友人交游甚密，意在谋求仕进。孟浩然自小受儒风浸染，“读书常闭门”（《入峡寄弟》），“俱怀鸿鹄志，昔有鹤鸣心”（《洗然弟竹亭》），胸怀鸿鹄之志，有建功立业之心。二十三岁前，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欲走终南捷径，愿望破灭之后，仕宦之心愈加强烈，积极干谒权贵，寻求仕进。“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早期干谒张说之作，可谓发其入仕之最强音，其寄希望张说举荐自己，以期位居人臣。“当涂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书怀贻京邑故人》亦作于其入京之前，诗人时乖运蹇，而望京邑故人援引，早日位列宫阙，仕宦情怀甚烈。

“学而优则仕”，出于出仕目的，孟浩然与诸多官员唱和赠答，看似称赞之语，实则表出仕之心。“逸思高秋发，欢情落景催。国人咸寡和，遥愧洛阳才”（《和贾主簿弃九日登岷山》），贾升才华堪与洛阳贾生比肩，然无人能和，即所谓“曲高和寡”，怀才不遇，实为孟浩然自身遭遇。屡次求人引荐无果之后，孟浩然选择赴长安应举，可事与愿违，举进士不第，孟浩然心灰意冷，遂宣称“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表示其不趋富贵，而欲归隐山林。

“落羽更分飞,谁能不惊骨”(《送从弟邕下第后寻会稽》),孟浩然落第,异常苦闷,离开长安后游蓟门、洛阳,而后漫游吴越。然其狎鸥山水,优游林下,精神并未得以解脱,鸿鹄之志亦始终未能平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孟浩然漫游吴越,并未绝尘息游,一心向道,寻僧访道之余,亦积极主动拜谒结识当地官员,彼此诗酒唱和,其实则是为扩大自身政治社交之圈,谋求仕进,如《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等作即是足资明证。“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念离当夏首,漂泊指炎裔”(《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诗人为李主簿大材小用而深感惋惜,实则是表自身用世之意。“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诗人留别裴刘二少府之时,更见其对科考失利难以释怀。

张九龄、王昌龄等友人得以擢升之后,其仕进之心再度萌发,“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开元二十二年,孟浩然再度入京求仕,仍无果而返,“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留别王维》),其落拓之悲可知而知。开元二十三年,韩朝宗相约其赴京加以荐举,其未践约而行,错失良机,然其仕宦之心并未泯灭,“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陪卢明府泛舟回岷山作》),其内心仍望好友居显位之时予以提携,“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洞庭湖寄阎九》)。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其入幕,冀以实现其志愿,其随张九龄车骑游猎,冠盖祠山,因受赏识而欢欣,“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荆门上张丞相》),“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陪张丞相登嵩阳楼》)。然屈居幕僚,终非其所愿,“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而后其对幕府生活深感厌倦。开元二十六年,孟浩然患背疽,遂归隐襄阳。

积极用世是儒家倡导之精神,孟浩然早年隐居待仕,不惑之年应进士落第之后,积极与官友交游,寄希望官友能荐举入仕,然终未能如其所愿,直至

晚年蛰居故乡,仕宦之心仍未泯灭。“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孟浩然终身用世之心未弃,既缘于盛唐进取精神之召唤,又缘于崇儒家风之浸染。

三、结语

盛唐时代可谓儒道并用,且渐趋调和,孟浩然亦言“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为儒家出世之准则,孟浩然身处盛唐,政治较为开明,可谓为“邦有道”,遂孟浩然执着于仕途,因无人荐举而落第,终未遂其愿,遂无奈归隐。名为“有道”之盛唐,实则隐藏用人“无道”,盛唐以朝野荐贤之风著称,实则朝廷任人唯亲、取人不公之事数见不鲜,其遂生“无道则隐”之念,“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除夜乐城逢张少府》)。孟浩然常为前贤遭弃而鸣不平,“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晚春卧病寄张八》),此举实则为自身遭遇鸣不平,控诉空有举贤任能之盛唐。孟浩然是盛唐隐逸之典型,不失为盛唐诸多终身不遇之文士代言,盛唐精神赋予其积极进取之心,然不公之现实则又使其仕途蹭蹬。

朝廷用人不公、权臣官友未荐,孟浩然仕进无门,便寻僧访道,优游山水,寻求精神寄托,其早期为仕而隐,后期则是不遇而隐。由此观之,孟浩然归隐山林,实则为仕进无门之举,并非纯粹却除尘累,高蹈世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9]与陶渊明相比,孟浩然仕进思想具有“恒定性”,仕进情怀贯穿其整个人生。

当下诸多学人强化其隐逸情怀,而淡化其仕进精神,恐掩盖其真实形象。总而言之,孟浩然并非遁世隐迹之处士,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儒家仕进思想方为其思想之主流。孟浩然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拯世济民,仕宦之心甚烈,既是盛唐时代精神感召使然,亦是盛唐进取精神之反映。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柯宝成.孟浩然全集汇编校注汇评[M].武汉:崇文书局,2013:16.下文所引孟浩然诗句未作特殊说明,均源自该著.
- [2] 宁松夫.论孟浩然隐逸思想的成因[J].襄樊学院学报,2004(4).
- [3]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50.
- [4] 陈贻焮.谈孟浩然的“隐逸”[N].光明日报,1954-08-22.
- [5]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9.
- [6]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7.
- [7] 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4-65.

[7]李景白.“孟浩然遇唐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J].甘肃社会科学,1984(1):81.

[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

[9]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06.

From Meng Hao-ran's Poems Presented by Each Other Friends to See His Secluded Feeling and Officialdom Spirit

ZHOU Xin-min, YANG Zhao-q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By analyzing Meng Hao-ran's Conversation Poems, we can see that the object of his make friends very broad, both court officials, another mountain hermit, recluse feelings and officialdom spirit coexist. Meng Hao-ran's hermit road is not a traditional hidden, but hidden Confucianism, hermit thought was his officialdom ideas derived thing. The spirit of Tang Dynasty and family tradition of advocate Confucianism prompted him to keep making progress. Confucian officialdom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stream thinking of its concept, and throughout its entire life.

Key words: Meng Hao-ran; make friends Conversation Poems; secluded feeling; officialdom spirit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11页)

小句是语法教学的核心,古代汉语句型教学应以小句为中枢,向下研究在句法中的词(字)、词组用法,向上将句型的特点放在复句、句群中去延伸,在结构和语义上下功夫,促进句型教学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邢福义.小句中枢说[J].中国语文,1996(6).

[2]李芳杰.小句中枢说与句型研究和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1(3).

[3]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语法修辞[M].高等教育出版社.

[4]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

[5]洪波.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6]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商务印书馆.

An Analysis of Judgment Sentences in Archaic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lausal Pivot

SHI Liang-yu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lausal pivot re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study on grammar of Chinese, so it is adopted as the basis to analyze the judgment sentences in archaic Chinese in the paper 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ntax and meanings of judgment clauses in compound sentences is focuse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sentence pattern teaching.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clausal pivot; sentence pattern teaching; judgment sentences

(责任编辑:周锦鹤)